

中华 爱国魂

革命烈士分册

钱均 鲁越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华爱国魂

(革命烈士分册)

钱均 鲁越 主编

参加撰稿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泉玉	马 进	马美玲	文海涛
吕剑光	吴巧平	里 外	陈 博
阎加伟	谢 晖	薛 海	魏 曼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爱国魂/钱均,鲁越主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2

ISBN 7-80091-581-6

Ⅰ. 中… Ⅱ. ①钱… ②鲁… Ⅲ. 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N. D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1463 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100050)

永清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印张 24.375 字数 500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一版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套

ISBN 7-80091-581-6/G·273

(全五册)定价:20.00 元

目 录

李大钊	(1)
邓中夏	(18)
蔡和森	(31)
黄公略	(45)
瞿秋白	(60)
方志敏	(76)
夏明翰	(91)
左 权	(110)
董存瑞	(123)
雷 锋	(135)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河北人。1913年春,出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言治》月刊。同年冬,东渡日本。在日本发起神州学会。1916年任《晨钟》报总编。1920年,发起并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组建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管北方工作,成绩显赫。1927年被奉系军阀逮捕,于9月28日,被绞死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苦娃的少年

1889年10月29日,一个婴儿在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普通人家呱呱坠地。婴儿的母亲戴着孝,紧抱怀中啼哭的小生命,含泪念叨:“孩子,生下来就见不到爹爹了,我的小命根子呀……”孩子的爹爹是个读书人,早年就得了肺病,几个月前刚刚去世,丢下这怀着孕的媳妇。谁知这苦命的孩子将来又会有怎样的遭遇?

过了不到16个月,孩子的妈妈连愁带病,也去世了。这下,苦命的“小憨头”便只有一个爷爷可依靠了。从此,爷

爷便开始喂他吃饭，教他说话，领着他一步一步学走路。其实，小家伙并不是老爷爷的亲孙子。只不过因老人没有儿子，小家伙的爸爸便过继给这位李爷爷。老人家总怕家里断了香火，对小家伙怜爱备至。老人对小家伙的喜爱，从起的名字就看得出，老人给孩子起名为“憨头”，就是希望他长得又结实、又机灵。

可是，小憨头有个很凶的姑姑。姑姑见老人家年事已高，一旦死去，财产就会归孩子，所以常对小憨头瞪眼睛。有一次，她发起脾气，竟然拿起菜刀，嚷着要杀死她父亲的这个过继孙子。

小憨头长到七岁，爷爷便送他到当地私塾跟单子鳌先生读书。先生给憨头取了个名字：名耆年，字寿昌。因为他在家里认了许多字，所以能跟稍大的孩子一起读四书。

一天晚上，他问一个常来他家的表姑：“你为啥不认字呢？”表姑笑答：“我没上过学呀。”“你为啥不上学呢？”“我是个女的，又不考秀才！”“女的，为啥就不念书呢？”小小的耆年，在这时就接触到了一个社会大课题。

耆年上了中学，益发刻苦，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他还在课余时间读了倡导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大量书籍，颇受启发，一心要为救中国找出路。两年后，爷爷去世了。爷爷仅有的一点家产，被姑姑和亲戚们几乎挥霍一光。耆年依靠妻子筹措的盘缠，到天津投考学校。他得知天津正有三所学校在招考：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法政专门学校。他不喜欢医学，又觉得入银行学理财，只能找到个人致富的路，这并非他的志向。于是，他选择了法政专门学校。从此，他在这里度过了六年的寒窗生活。

在法政专门学校里，耆年遇上了一位教史地的白雅雨先生。他滔滔不绝地讲历代兴亡，指责清朝统治者荒淫无度。

辛亥革命前一年，天津学界为要求清政府设立国会而举行罢课。罢课期间，白先生就说：“罢课，这就好比去向老虎要它的皮一样，会有什么结果呢？”这话，给耆年印象很深。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耆年就很少在学校见到白先生。次年1月2日，滦州起义爆发后，不到一星期就被镇压了，起义领导人受到残酷迫害。消息传到学校，李大钊才知道，白雅雨先生就是这支北方革命军的参谋长。

白雅雨先生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耆年。

东渡扶桑

1913年，耆年从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抱着新的希望东渡日本，并在此时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即“李大钊”。

严冬，李大钊登上远航的轮船。到东京不久，他遇上一件难忘的事情。那一次，李大钊去军事博物馆参观，随着人流走进战利军械大厅，大厅里堂皇地陈列着许多甲午海战以及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缴获的中国兵器。顿时，他感到心灵受到极大的刺伤，这些日军的战利品就是中国人的耻辱啊！就是华夏民族的悲哀啊！突然，一阵喧闹声打断李大钊的思绪。回头看去，只见一群人围在大厅尽端。从嗡嗡的人声中传出两个最大、最响的声音。仔细一听，两个主角竟都操着华语叫骂。出于好奇，李大钊也凑上前来个明白。人群包围着两个青年，一个是扎着“猪尾巴”的留学生，一个是西装革履的新青年，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个不停。

“你这条保皇狗也来了？快把眼睛睁大点，看看日本的一件件战利品吧！”西装青年大叫。

“这、这和大清国无关！……你们这些洋务派……小奴才……”

“胡说！”西装青年气得青筋暴起，用手使劲一推，把留辫子的留学生差点推倒。那条辫子在背后荡了又荡，更激起西装青年的愤怒，他大喊：“清王朝完蛋了，你这猪尾巴割不割？”说着，紧逼上来。“你，你敢！”“辫子”边说边躲。西装青年突然取出一把剪刀，大笑紧逼。这样，一个要剪，一个坚决不让，两个扭打一团。而周围看热闹日本人还不时发出哄笑和喝彩，就像在看一场激烈的相扑比赛。这时，馆内工作人员赶来，好不容易才把两人分开，并把他们推出门外。李大钊出了馆门，见西装青年仍提着剪刀大骂。李大钊快步走过去，语重心长地说：“同胞！您的义举真的很令人钦佩，可是您不该选择这种场合。”青年显然有些尴尬，但还是信服地点点头。

经历了这件事，李大钊下定决心，发誓一定要尽自己所能去拯救国民。

在日留学期间，李大钊和不少进步青年交往极其密切。他们着手研究在出国前就已听说过的社会主义。李大钊找到了英、日两种译本的《共产党宣言》，还看了《资本论》的通俗解说。

身在国外，心系祖国。1914年，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李大钊发表了一篇名为《国情》的文章，批判了古德诺、有贺长雄的反动观点，揭露了袁世凯公布的所谓“新约法”、准备称帝的阴谋，并警告全国人民：

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路应由自己走，决不能听任侵略者的摆布。一年后，袁世凯正式宣布恢复帝制。当时，李大钊已经团结了一大批旅日留学生，并成立了一些组织，如“神州学会”等进行反袁活动。

1916年春节前，李大钊回国，准备联系各方面力量进行讨袁义举。

归途轶事

“六月的天，孩儿的脸。”一天晚上，天气闷热，李大钊和两个朋友背着行李走到黄浦江码头，准备登上返天津的轮船。船黎明才起航，他们便留下一人看守行李，李大钊和另一位朋友到岸上，简单吃了饭，便一同漫步江边。他们走到一张长椅前面，静静地坐下来谈论码头的见闻。猛一抬头，看见离他们不远处，矗立着一尊太平天国时期给清政府帮了大忙的戈登的铜像。恰在这时，身后发出英文的叫骂声：“嘿！混蛋！快滚开！这里不是你们坐的地方！”原来，说话的人是个英国警长，恶狠狠地抡着一根棍子，像赶猫狗一样轰人！

“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坐在这里？”李大钊愤然回击。英国警察蛮横地叫嚷，并要把他们逮到捕房去。李大钊气愤万分。

临走时，李大钊回头怒向戈登铜像，暗暗发誓道：“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侵略者的铜像推翻掉！”

“新铭号”轮船在一声汽笛声中驶出港口，驶向浩瀚的海面。李大钊坐在船舱里，筹划着就要问世的报纸的事情。次日清晨，一夜难眠的李大钊早早踱出舱外，望着翻滚的浪花

和喷薄欲出的朝阳，他精神抖擞地欣赏着这海上美景。海边又不时传来或远或近的渔船启航的螺号。他突然浑身一振，就叫这份即将出世的报纸为“晨钟”！

“晨钟”的历程

《晨钟》报经历了大约两个月的紧张筹措，终于于1916年8月15日创刊了。

李大钊亲自设计了一个古钟的图案，排在每天社论的前面，钟面上每天换一条警句。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一文，副题为“青春中华之创造”，公开表明“晨钟”的宗旨。

《晨钟》报的社址，位于丞相胡同，紧挨着抗金英雄文天祥祠庙。李大钊每天排完稿件之后，经常在屋子里缓缓踱步，默默地吟诵着千古不朽的《正气歌》，每每读起都深深为英雄的气概所折服，并以此自勉。

李大钊认为，《晨钟》应是“高撞自由之钟”，以新文化的振兴为己任。他在第六期的古钟警句中写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他所喜爱的一句诗，也是他在文章中所透出的一种气节。

李大钊把创造“青春中华”的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觉醒上，欲任“《晨钟》之声”，撞击“青春意志”；欲令“《晨钟》之韵”，成为“青年之舌”。他反复强调：“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

于是，《晨钟》上常发表一些针砭时弊，批驳、揭露当政

军阀、官僚丑恶行径的文章，并大力宣传民主思想。因此，李大钊成了政客们指责的中心，甚至也激怒了当时众议院议长、研究系主要成员汤化龙（即《晨钟》报的实际控制者）。

一天上午，李大钊刚刚写完一篇抨击北洋政府的评论。一位议员突然闯进屋来唐突拜访，先是寒暄，再是大赞李大钊的文章。话题一转，便说文章好虽好，但言辞过于激进。李大钊听出弦外之音，便说：“请转告汤议长，我只能听命于未来再造青春之中华。否则，我辞职！”

于是刚刚诞生 22 天的《晨钟》报随着李大钊的辞职成了奄奄闷鼓。为了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李大钊再次坐下来，提笔写下《晨钟》的“末篇”——《别泪》。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8 年初，李大钊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

当时北大的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他到北大的一年时间，竟然使北大的风气比从前大有改观。李大钊来到北大时，陈独秀已任文科学长了。从此，他们共同合作，不断为《新青年》注入新的血液。

在北大，李大钊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广泛结交青年学生，并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吸引着广大学生，每天都有前来借阅书籍和向李大钊求教的青年。一天上午，邓中夏带着毛泽东来到图书馆的主任办公室。邓中夏首先上前递上一封信，说道：“李主任，这是杨昌济教授给您的信。”李大钊接过信，迅速阅毕。然后热情地让座“都请坐吧！杨教授事先和我谈过

润之先生的事了，我看，就留在这里做一名图书馆助理员吧！”李大钊随便地问了句毛泽东赴法求学一事的进展，毛泽东说：“我认为寻求救国之路，主要是研究本国的实际。自然，探求救国的主义则是多样的。”一句话，便表明了毛泽东不太想出国的根本原因。

从此，毛泽东便在北大图书馆里开始了新的生活。由于毛泽东的家乡远在湖南，对于俄国的情况知之甚少；对于马克思主义更是一无所知。为了帮助毛泽东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和邓中夏借来当时所能找到的中文版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一本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初步学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四个月，李大钊一直热情地帮助他。同时，毛泽东也很愿在李大钊身边工作，并虚心向李大钊学习。再加上他主动参加北大的各种学术活动和阅读了大量的书刊，使这个在穷乡僻壤里长大的年轻人了解到了许多在家乡无法学到的知识。毛泽东学习踏实、谦虚，李大钊非常高兴，于是，他们在这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李大钊在北大红楼里传播着革命思想，就像是一盏指路明灯，照亮广大志士、青年的心。

到工人、学生中去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在英、美、法的操纵下开幕了。中国作为战胜国出现在和会上，提出要收回山东的要求。但日本却凭借与袁世凯签定的

“二十一条”欲占领山东。为了阻止这项不平等和约的签定，北京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

由于长期和青年学生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李大钊被学生公认为青年的最好指路人。

4月30日，学生们得知巴黎和会把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转交日本，愤怒至极。于5月3日晚，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代会，决定次日晨，北京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

由于北京大学率先领导起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反动政府便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施加很大的压力。5月9日，蔡元培校长被迫辞职出走。紧接着，李大钊带领北大教职员工代表，同北洋军阀交涉，坚决挽留蔡元培校长。

6月8日左右，李大钊、陈独秀共同商量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三天后，李大钊亲自到城南游艺园里散发传单。

9月，从天津来了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他们兴奋地告诉正在北大红楼里办公的李大钊，说他们已经在不久前成立了觉悟社。他们此行来京的任务，是请李大钊赴天津演讲，来帮助那里的青年。李大钊十分高兴地接受邀请，于9月20日上午，到天津演讲。来听讲的人很多，讲演厅里挤得密密匝匝。李大钊生动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阵阵掌声。当天下午，李大钊又同觉悟社的青年座谈。当时，坐在他旁边的就是周恩来。

1920年五一节，《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李大钊的一篇《“五一”May Day 运动史》。5月1日上午，北大校工和几百名学生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李大钊任主席，并讲了话。他提出工人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还指出

应多学一学苏俄的成功经验。

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初，陈独秀频繁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李大钊决定亲自把他送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

一个寒冷的日子，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化好装，乘着一辆布棚骡车出发了。李大钊怀里抱着几本帐簿，打扮成一个讨帐商人。而陈独秀则头顶一个破毡帽，身着一件大厨师的背心，衣服上油渍发着亮光。就这样，穿着破衣烂衫的陈独秀坐在车棚里，李大钊骑在车沿上，一路上遇到军警检查全由李大钊去机警对付，好不容易才回到乐亭县。当骡车前进在狭窄的黄土道上时，李大钊四下瞧瞧，只见辽阔的田野，并无行人，于是停下车来，和陈独秀商讨建立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大计。……

路程虽长，他们却忘记了疲劳；天虽然很冷，但他们仍谈得热火朝天……

到了乐亭县的大黑坨村，他们便到李大钊老家休息。小住几天后，便启程赶赴天津了。

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到北京，同行的还有助手马迈耶夫和马迈耶娃。他们三人到京后，通过北京大学俄语教师鲍立维介绍，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兴奋万分，和维金斯基畅所欲言，热烈探讨。李大钊还召开了许多座谈会，请北京的各界友人来和苏联朋友共同切磋、交流。

过了一段时间，李大钊和维金斯基又进行了一番探讨。维金斯基依据苏俄经验和在中国看到的状况，认为组织起中国

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已迫在眉睫，并提示到中国已经具备建党的条件了。为了加快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又设法介绍维金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会晤。

1920年9月，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李大钊又发起组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小组活动没有固定的地点，主要在李大钊的家里和图书馆主任办公室。

1920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周刊，由邓中夏负责具体编辑工作。周刊主要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很快在长辛店流行开来。后来，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工人们建立起了长辛店工会，这可算作我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在这期间，李大钊到郑州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在有些书里还记叙了李大钊在郑州的一段小故事：

“郑州的工人夜校成立后，大约是1921年3月的一天，学校老师对学员们郑重地说：‘你们明天换换衣服洗洗脸，因为北京的一名大员要和你们见面。’学生们都很纳闷，猜测着这位大员的名字，老师说：‘不要问名字，他叫李先生’。一名学员偷着问老师，老师便告诉他来人是李大钊先生，但让他坚决保密。

第二天，李大钊来到学校，一见面就说：‘职工们都好啊’。并恳切地勉励大家：‘你们要好好学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比得上天高呢。’说罢，回身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写了个‘人’字，两个字连起来正成一‘天’，‘你们好好努力吧，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呢！’话音刚落，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些实践活动，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走出了教条，很

好地将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措工作，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两名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即将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李大钊由于校内工作较忙，另外还要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没能去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展。

党的建立，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人之一。

生活中的李大钊

虽然李大钊每天都有许多工作要做，从早忙到晚，但他并没有对孩子失去耐心，也没有使生活失去乐趣。他的生活总是充满笑声的。他爱诗爱音乐，也爱绘画。

有一次，他领孩子去散步，走到小市，发现一架破风琴。他高高兴兴地把风琴买回来，小心翼翼地用布擦了又擦，然后又认真把它修好。一有空，他就坐下来边弹边唱。

夏天，他有时把琴搬到院子里教孩子们唱歌。远近的孩子都跑来了，把他拥在中间，围着他唱啊、笑啊，好不热闹！

李大钊从苏联回国后，他常给孩子讲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苏联儿童的幸福生活。他还把和苏联儿童的合影拿给孩子们看，还不时在旁边深情地说：“这些小孩子，都是在革命的风雨中开起来的鲜红的花朵，其精神气度完全与旧社会的孩子不同。”

李大钊在文章和演讲中都竭力反对妇女缠足，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如此，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妇女获得解放。他曾

帮助村里一个姑娘说服姑娘的父亲，给姑娘放开了脚。这件事影响很大，大黑坨村许多姑娘都不缠足了。李大钊还帮助过一个四川的女学生秦德君，为她解决了种种困难并引导她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天，蔡元培和李大钊正在办公室里谈论授课问题。一名叫赵尔康的学生领进一个懦弱、瘦小的学生。那个弱小的男孩子长着一双俊俏的大眼睛，头上戴着一顶略微显大的学生帽，身着一件破旧的上衣。蔡元培让两个学生坐下。赵尔康指着较小的学生说：“他叫秦君，是新考取北京大学的学生，按规矩，新生入校要由本校两位教师签字，所以……”原来是要让李大钊给那个小小的学生作保人。李大钊痛快地接过入校保证书签了名，然后转向蔡元培。“蔡校长！这位学生来京上学不容易，您也做个保人吧？”蔡元培蘸了墨，也潇洒地签了名。然后把保证书递给学生，嘱咐道：“拿去吧！一定要好好读书！”

男孩双手颤抖着接过保证书，朝两位先生深深鞠了一躬，激动地说：“谢谢蔡校长！谢谢李主任！……”两位先生都被他那纤如女子的声音惊呆了。李大钊竟下意识地脱口直问：“你……说话怎么像女人的声音？”秦君吓得浑身发抖，“不、不”地争辩着。蔡元培仔细看着秦君的举动说：“你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学生。”秦君忙摘下帽子，指着光秃秃的脑袋说：“蔡校长！您看，我是男人，真是男人啊……”校长先是一惊，然后又看看秦君白皙的脖子和没有突出的喉头，生气地说：“赵尔康同学，带秦君同学找医生检查一下！”秦君见拗不过，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大哭起来。李大钊眼见这一切，心里有些眉目。便扶起秦君，平和地说：“秦君同学不要哭！说实话！”